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九期 ——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4c)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五)	孙怒涛
【往事追忆】	宋彬彬: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冯 翔
【拒绝遗忘】	回应宋彬彬等	王友琴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张放	王友琴
【抢救历史】	呼吁对卞案不追究当事者个人责任, 只公布真相	唐 燕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五)

• 孙怒涛 •

(上接 zk1404a, 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 (1968. 10—1980. 10))

### 第五节 一场飞来横祸, 从“积极分子”到五一六分子的落差

回校以后, 我在教研组里参加教育革命活动。

臭老九们, 工宣队进校以后都夹起尾巴做人。我先接受了几个月的工人阶级再教育, 又到部队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回来继续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宣队师傅对我这个派头头的印象好像不算太坏。到年底的时候, 她鼓励我要好好表现, 在今后的运动中以实际行动向工人阶级学习。

听这话, 我一时迷迷糊糊地觉得我似乎就要成为下一场运动的依靠对象了。

这下一场要开展的是什么样运动？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成为依靠对象，反而成了清查对象。

那个年代，谁都知道文革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在1966年颁布的《五一六通知》。至于一个叫“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即使曾听说，我也没往心里去。

1970年冬，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了，才知道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是杨、余、傅，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其时，自动控制系已经改名为电子工程系，有三个与控制相关的教研组（包括我所在的控制元件教研组）合并成有六七十个老师的大控制教研组。

估计年底前是在搞摸底排队吧，我感觉运动的暗流已在涌动。刚过1971年元旦不久，风云突变，学校掀起了揪斗五一六分子的高潮，一场围歼五一六分子的“人民战争”正式打响了。

那是在东主楼11区的一间大教室里，扶手椅、靠背椅围成一个大椭圆形。参加揭批五一六分子攻心会的有教研组的老师，还有1970年刚入学的控0班工农兵大学生128。会议的主持人是教研组的郝书记。

人很多。人多人气就高，会场的气氛相当热烈。因为是揪斗五一六分子，所以又平添了几分紧张和严肃。

郝书记在主席位上做了一番动员报告。无非是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介绍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如何的阴险恶毒，对革命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接着表示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五一六分子统统揪出来，把五一六集团一网打尽、除恶务尽。最后交代政策，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现成语句敦促五一六分子赶快缴械投降。

接着由工农兵大学生领头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人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那个人喊一句，大家跟着又喊一句。喊口号的时候，右手拿着红宝书，伸手举过头顶。经过几年文革的训练，这一标准动作已经做到整齐划一。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反周总理的，而周总理是我最敬仰的中央首长，所以我对五一六分子特别地痛恨！我也与大家一样扯着喉咙高喊口号，以此表达革命的义愤。

我一边喊口号一边在想，真的有五一六分子吗？难道我们教研组的老师中真的有五一六分子？我很怀疑，也很好奇，更有一点莫名的期待，想看看究竟谁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五一六分子。

这头一个晚上的战斗没有收获。郝书记在临散会的时候警告五一六分子，回去好好想想，赶紧坦白，想心存侥幸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了学校运动的重中之重。大喇叭不断广播各单位清查的最新消息，包括已经有某某等多少人被挖出来的战斗捷报。大会政策宣讲，小会政策攻心，检举、揭发、自首、坦白，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第二天晚上继续开会。这次，安排了更多的工农兵大学生来参加会议，壮大声势。近百人把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显然，政策攻心的火力会比昨晚更猛烈。

会议的进程与上一次大同小异。郝书记在讲话中特别点明了这些五一六分子一个个都是填过表的，证据确凿，想逃是逃不掉的。被人揭发，不如自己交代主动。何况有的只是胁从，不是骨干。现在给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要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话，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工农兵大学生呼的口号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五一六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一边连声高呼这些口号，一边用手指指向教师的方向。同一个巨大的声音，同一个划一的指向，这震慑力是相当大的。每个教师都能感觉到那手指就像是在指着自已似的，指得你心里慌兮兮。

我还好。我连五一六集团这个组织都没怎么听说过，更没有填过什么表格，我跟五一六根本就不搭界。我想，我就举举手、喊喊口号、瞧瞧热闹，也不错的。

我还怀疑，就这样所谓的“政策攻心”，真能把填过表格顽固死硬的五一六分子攻出来？

正想着呢，突然，角落里有一人腾地站了起来，嘴里蠕蠕地说：“我坦白，我交代……”

全教室的眼光如同探照灯一样，全集中到他的身上。

我不认识这位老师，因为他原先是另一个教研组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姓贺，一位年轻的教师。

郝书记一看有人站起来了，满面红光，兴奋之极，大声喝问：“你是五一六分子吗？”贺老师回答：“是的”。“你填表了吗？”“填了”。“那你赶快交代你的罪行！”

贺老师虽然是低声交代，但是，在瞬间安静异常的教室里，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说他参加了武斗，给武斗的人送过东西，等等。

郝书记追问：“武斗中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打死人？”贺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于是郝书记厉声说：“你要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要竹筒倒豆子，不要避重就轻，要知道，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小的时候，村旁的小河里长着很多鱼虾。有很多种打鱼的方法，捕鱼的工具。有一种办法最绝了。柯鱼佬（渔夫）坐在小渔船上，用一截木棍击打船帮。那低沉的梆梆声通过船体传导到水里。在渔船附近的鱼儿时间一长受不了梆梆声波的震扰就会跃出水面。柯鱼佬一手敲木棍，一手持网兜。见鱼儿往上一跳，柯鱼佬眼疾手快，一兜，兜个正着。更有些呆头呆脑的鱼儿，往高跳斜了，正好跳进船舱里，抓都用不着抓的。这样的逮鱼，简直是无本生意，空手套白狼，连鱼钩鱼饵都省去了。

我以为只有在柯鱼时候才看得到的有趣场景，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也让我见识了一番。郝

书记一声断喝，大伙儿一齐咋呼，犹如柯鱼佬敲打船帮一般，果然有贺老师这样的五一六“鱼儿”被震出来了。可怜的贺老师满脸煞白，神色惊恐，无助地站在那儿。面对众人要他交代罪行、要他端正态度的威吓声，他不知从何说起才好。

有第一条“鱼儿”被震出来，那些做了点错事的人，或者填过一张什么表格现在连自己也不记得是什么内容的人，心里更打鼓了。于是，在以后的几次大会上，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先后又有几个老师被震得站了起来。

其中有一位是姓涂的老师，他与我一样也是同届留校的，他也站起来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原先教研组的一位很年轻的实验室老师，我们叫她小黄师傅的，在一次攻心会上，也站起来了。我看到她刚站起来的那一瞬间，虽然神色紧张，嘴角却挂着僵硬的异样微笑，小声地说她也是。大家惊异地注视着她。只听得郝书记威严地喝问了一声：“你还敢笑？”小黄师傅一听，马上收起这不合时宜的笑容，瞬间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哭了。郝书记又大喝一声：“怎么又哭啦？”小黄师傅撇撇嘴，赶紧收住眼泪，只是泪珠儿还挂在脸上，在日光灯下闪光，又不敢用手去擦。大家听着这段类似于座山雕与杨子荣的对话129，有些人想笑又不敢笑出声儿来，只好捂着嘴偷偷地窃笑。这逃不过郝书记犀利的眼睛和灵敏的听觉，他用更大的声音喝道：“严肃点！”这一声显然是对着大家说的。

这是严肃的政治运动吗？看起来这似乎更像是一场街头活报剧。但这闹剧确实不是好玩儿的。一旦被揪了出来，就要写交代材料，不查个底朝天是不会罢休的。真的要是查出点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矛盾性质就转化了，就不是隔离审查那么简单了，就要进班房，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苦头了，这一辈子就完了。今天说起来，就像是闹着玩儿似的，而在当时，那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一诈唬就站起来的老教师，哪一个都不是五一六分子，他们只是做了些自己认为有点问题的事情。因为搞不清这问题算多大，于是先站起来表示一个主动坦白的态度再说，并非是因为问题很严重才站起来的。

已经揪出了好几个五一六分子，揪斗会好像还没有就此收场的意思。这几个五一六分子，好像哪一个都不是郝书记心目中真正要揪出来的人。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郝书记开门见山的说：“这几天的运动，战果很大，不少五一六分子迫于政策的压力，纷纷主动站了起来向人民投降，这态度是好的。但是（他特别提高了声调强调‘但是’），有那么一小撮顽固不化的五一六分子，就混在我们革命群众的队伍里，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梦想蒙混过关。这是一条大鱼儿！今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大鱼揪出来示众！”

我心想，还是大鱼儿？乖乖，有意思。不知道这条大鱼儿究竟是谁啊？

郝书记接着说：“我给这个五一六分子画个像，提醒他一下，也敦促他一下，看他还往哪里藏？这个人呀，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装着斯文的样子，其实内心是很恐慌的。这个人在哪里呀？他就混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

当郝书记说“就是这里”的时候，他的手指往前一指。

随着他的口令、他的手指，在郝书记旁边的一群工农兵大学生都跟着齐刷刷地伸着胳膊往前一指。

这手指所指的方向是向着我这边的。我心想，难道这个五一六分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下意识地往左边张望了一下，看见左边同学老师的手指也是指向我这里的。哦，原来这个五一六分子坐在我的右边。我心里正这样想，扭头往右边一看，发现右边的同学老师的手指也是指向我这边的。左顾右盼以后，看到我成了大家手指和目光的交叉点，我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郝书记心目中的那条五一六大鱼儿就是我啊！

此时，口号声此起彼落，一声高过一声。一拨人的口号声响起：“五一六分子在哪里？”另一拨人的口号声呼应：“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每当喊“五一六分子在哪里”的时候，人们的右手缩回到肩头。每当喊“五一六分子在这里”的时候，全体的手指、全体的目光，齐刷刷地，如利剑一般的指向我、刺向我。这个时候，用“千夫所指”这个词儿来形容还有点夸张，“百夫所指”是最恰当最形象的了。我不知道这场戏有没有预先排练过，但是预先告知过目标是谁，这点是肯定的。

最有意思的是我身后坐着的那位我一直很尊重的比我年长不少的柳老师。他担心从背后指向我的后脑勺我看不到，于是把手从后右方弯着伸过来。当我听到“五一六分子在这里”的时候，我用余光瞄见有一只手似乎要从背后抱我一般，却见他的食指已经指在我的心口上了。

“五一六分子在哪里？”

“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反反复复就是这两句口号。本来我是想瞧瞧热闹的，没想到成了别人瞧热闹的对象。

我心中不禁哑然失笑。

我是五一六分子？我对自己清楚得很。要说在文革中我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我完全承认的。要我承认自己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是五一六分子，我没问题，我怕什么呀？我慌什么呀？

听得口号声又换了花样。人们对着我高喊：“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五一六分子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声浪似乎把教室的天花板都要掀翻了，场面蔚为壮观而激烈。听着那坚定的口号声，我知道，今晚不把我这条大鱼揪出来是不会罢休的了。

我很感激前几年当头头时经历过的风浪锻炼。大礼堂、大操场的大辩论，与戚本禹等大人物顶过嘴、交过锋，见过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被撞上的1。4武斗，这些与今晚这点小儿科的把戏相比，真算不了啥。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场面的历练，就像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大字报上点我的名，我就吓得半死，更不要说面对今天的怒吼了。前面几位被吓得站起来的老师，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才心慌意乱地被震了出来。

我知道今晚我已经成了政策攻心会的唯一对象。既然是这场好戏的“主角”了，那就不能以旁观者瞧热闹的心态来对待了，我得认真起来。

“五一六分子在哪里？五一六分子在这里！”

“五一六分子站起来！”

这两句口号不断地交替喊着。大家指的是我，但是又不点我的名。我知道，只要我一站起

来，就是自己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头脑再简单，还是知道这是个陷阱。我打定主意，只要你们不点我的名，我就这样坐着、赖着、硬顶着，就是不主动站起来。

有道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政治运动经历多了，谁都可能修炼成“老运动员”的。我就准备当这头“死猪”了！

僵持的局面足足维持了十来分钟。郝书记看着我，我也毫不示弱地甚至带点挑衅地看着他。我见他满眼冒火，一时无计可施。点名把我叫起来，当然是可以的，只是那样就显示不出政策攻心的威力了。我自己吓得站起来与被他点名站起来，虽然都是站起来的效果，但是我与他在心理上的成败感是大不一样的。

我背靠着扶手椅，脸上挂着一丝不屑的冷笑，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夹着小开本的红宝书无意识地在椅子桌面上一墩一墩的墩着。那模样，在郝书记的眼里肯定是一条软硬不吃的“癞皮狗”。

聪明机灵的郝书记终于发现我有破绽可乘。他突然厉声地责问我：“孙怒涛，你不恭恭敬敬地握着红宝书，你这样一墩一墩的墩着，这是对红宝书的大不敬，也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不忠！你给我站起来！”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顾全他的颜面又能把我揪出来的理由。

于是群众的口号声变成了：“孙怒涛，站起来！”“孙怒涛，站起来！”

既然点到我的名字了，再不敢站起来，那真的是一条“癞皮狗”了。站起来就站起来，有什么好怕的？我觉得尽管我是绝对的孤立，但是最终你郝书记还是不得不点了我的名我才站起来的，我在心理上已经胜了一筹。

我不想再让郝书记费心找其他的理由了，也不想被人拖着站起来。我就在座位上笔挺地站着。他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他，四目相对。

他开始审问我了：“你参加五一六了吗？”

我回答：“没有！”

“你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吗？”

废话，没参加五一六，怎么会是五一六分子呢？不过我不想与他论理，回答：“不是。”

这样的回答，这样的态度，理所当然地激起革命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发言，要打掉我嚣张的气焰、顽固的态度。

其他众多的发言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他是这样质问我的：“你是4 1 4的第二号头头。想当年，你跺跺脚，清华园都要抖一抖的！你不是五一六分子，还有谁是五一六分子？”

我被他丰富的想象力引得差一点要笑出声来。要是说蒯大富跺跺脚清华园要抖一抖，还比较符合实际的。即便是沈如槐，我看还没有跺跺脚清华园要抖一抖的能量，更何况是我？他那么“抬举”我，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个晚上攻心会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是早就内定好的，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我揪出来。我

要是不站起来，攻心会可能一直会开下去。

不管自己站起来也好，被点名站起来也好，总之，我是被揪出来了，攻心会胜利结束，对我的审查开始了。

说实在的，即使在当时，我对参加攻心会的所有人都没有什么怨恨。他们都是被运动来当“演员”的。

郝书记作为最基层的党的干部，他必须执行校党委、系总支的指示或命令。不管他自己是不是相信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或者五一六分子，他在这个职位上如果要待下去，他就得把我这样的大鱼揪出来，否则就交不了差、过不了关。而且，揪我的方法还比较文明，并没有动粗。

工农兵大学生是带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的使命来清华的。他们被拉来参加攻心会，只是当个枪子儿，壮壮声势而已。那位工农兵大学生质问我的话，明显是有人授意的。

至于那些教师，也就是跟着呼呼口号。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一样会是这样的态度。前几个五一六分子揪出来的那些攻心会上，我不也与他们一样的举着语录本呼口号的吗？

散会后，我被人陪着回9号楼的宿舍。这一路上，我心里对领导的安排真有点感动，因为他对一个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还这样关心。

到宿舍后，我想睡觉了，我想陪我来的那位也该马上离开去休息了吧？

他先把窗户都关了，插上插销，却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是与我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同学，彼此比较熟悉友好。我问他，你要睡在这里？他说是的。我有点听不懂似的看着他，突然明白了：原来我被隔离、被“保护”起来了。于是刚才的那点感动瞬间化为乌有。

我没好气地问：“是不是怕我跳楼自杀啊？”他没吱声。我说：“我又没做坏事，我还不死呢。”

不管我什么的牢骚满腹，不给好脸色，他倒是很沉得住气，尽他对我的“保护”之责。后来听说他是我的专案组组长。

算不算隔离了？因为没有正式宣布我被隔离审查，所以，我也不能完全肯定。这是一笔糊涂账。这为那些将来想赖账的责任人留下了足够的狡辩空间。不算隔离吧，他随时跟着，我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要说是隔离，我好像还有不少的自由，基本上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不像是强迫软禁，只能在限定的空间里活动。好在我并不是那种喜欢制造麻烦的主儿。我很自觉。不就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吗？那我就老老实实在宿舍里写。除了去食堂打饭，其他时间都在宿舍里。

我这个人偶尔也会犯倔脾气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真想一个字的交代都不写。我又没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集团、五一六罪行等等统统与我无关，我有什么可交代的？但是转念一想，既然把我揪出来了，不写点材料，他们怎么下台呢？他们下不了台，我就得这样一直被隔离着，得不到解脱。我怎么耗得过他们？罢了！为他们，也为自己，那就写点东西吧。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隔离慢慢的松懈了。是觉得我的问题不大？还是觉得我态度不错？还是因为看到我心态良好没有想自杀的样子？总之，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他不再跟着我了，不再与我一起睡觉了。我这条在严肃的场合被隆重揪出来的大鱼儿，很快成了小鱼虾似的，这又让我生出一丝不被“重视”的失落感。当然，完全自由的感觉真好！

交代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断的要求我继续写，越详细越好。我也就不断的写着。

开始写文革中我经历的事情。其实，在68年下半年已经详细交代过了，我就换一个题目再交代。接着写思想根源、危害性。写完了，还要我写。再写什么呢？我挖空心思地想。于是把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写上。再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挖思想根源、危害性。我想，写的材料足足有几十页吧。

我的记忆力实在糟糕透顶。虽然我经历的那些事儿才过去两三年，可是好多事情都印象模糊了。那情节、人物、时间、地点都混在一起，搞不灵清了。我没办法分辨，就都写上去。反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又不是我成心想搞糗糊。

至于上纲上线，我是特别注意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呀，派性严重呀，这些都是必须着重说的，而且也是事实。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之类的上纲上线是绝对不能写的。有人喜欢大帽子下面开小差的交代手法，我不习惯。

在整个审查期间，我的态度一直是老实的，配合的。但是，也与专案组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这在我《致专案组的申明》中有这样的记录：

一星期前，专案组的朱师傅叫我重抄我在68年清队时写的一份《交代与揭发》中的部分内容。那上面“检查”了自己反“伯达同志”言行以及涉及到一些“林副主席”的事。这些地方，专案组同志未经我本人同意，已在我写的材料上用墨笔涂改多处。对此，我申明如下：以新的观点重写材料是可以的，涂改则是不必要的。尤其是擅自涂改原始材料，既不能称得上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也谈不到是认真严肃的态度。尽管我遵命重抄了部分材料，但为备忘计，我必须把自己的观点申述清楚。我期望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否则，我对我所写的全部材料无法负责到底。

此致敬礼！

孙怒涛 1971.1.26

竟然涂改我写的原始材料，以后怎么分得清是我自己涂改的还是别人涂改的？这事让我非常生气！本来想写成“严重抗议”的，想想，人在屋檐下，发“红卫兵小将”脾气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1月26日，这天正好是除夕。这是个灾难之年，一点也没过好。

写了好几个月交代揭发和旁证材料，写到最后实在没什么东西可写的了。我要求回教研组，接受群众的监督，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专案组同意了，于是我回到教研组做点杂务。

我听说蒯大富、沈如槐都被揪回清华，隔离审查了。没见过沈如槐，见过一次蒯大富。在路上，远远见到他，身后有两个“保镖”跟着。听说蒋南峰也被隔离了，态度很不好。我知道蒋南峰的脾气是很耿直、很倔强的。



再后来，我听说清华分配到外地的学生，不管是老团还是老四，许多人都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挨整了，有的被整得惨不忍睹，还有自杀的。在清华，几乎人人都参加了两派。参加过武斗的也有好几百人，而且大家都理解那个时候的运动背景，所以，只要不是有点名气的头头，只要不是犯了开了枪、打死人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像我前面几位老师如果自己不在攻心会上跳出来的话，也没什么事情。而分到外地的学生就不同了。那里的领导正为缺个典型过不了这个运动的关而发愁呢，一听说是清华来的，也搞不明白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清华两派是怎么回事，先隔离起来再说。到清华来外调，即使完全实事求是的介绍，清华人认为是极其普通的小事，外地单位就能拿来大做文章。那时迟群领导的工宣队掌清华大权。工宣队一样是极左的，又吃了团派开枪的大亏，对团派格外恨一点，已经分配出去的也会主动给外单位寄材料。所以分配在外地的老团在清查五一六中遭的罪就更多更重了。

听人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因为清查五一六中，全校老团被清出来的要比老四多得多。我们教研组里就有两个敌我性质的老团，一个是打死孙华栋的大名鼎鼎的“狗熊”，一个是在七二七中有血案在身的孙国富。有严重问题的团四比例太不平衡了。为了表示工宣队对两派一碗水端平的政策，为了不至于因清查运动而派性复发，于是就把我这个4 1 4的二号头头揪了出来，成了天平另一端的“砝码”，起到了平衡一碗水的作用。

此话有几分真，我是存疑的，算是安慰剂吧。

我写的这些材料，让领导有点头疼。一是没什么干货，水分太多，阅读材料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另外一个，可能更让他们生气：要去落实我的这些交代材料，最后发现不少事情张冠李戴，或者时间、地点、情节错位，浪费的精力和时间就更多了。所以，他们对我的印象不太好，说看似老实，实际也不老实。我觉得好冤枉哦。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没什么问题，我交代的東西里也没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只是我罗里吧嗦的把好些人和事都扯上了，肯定给这些朋友增添了不少麻烦。这让我一直很内疚。

审查中有过几次“过堂”，其中有一次印象最深刻：

一位工宣队领导问：“你参加武斗了吗？”

我答：“百日大武斗没有参加，生病回家了。”

“这么说来，炸高压线、抬尸游行都与你无关啦？”

“是的”。我心里想，我又没有分身术。

“‘火烧英国代办处’你参加了吗？”

“没有参加。但是我知道的。”我这答话有点含糊，避重就轻。

“那么揪‘军内一小撮’呢？你有没有外出搞什么活动？”

“我没出去。我还积极传达周总理不要外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指示呢”。我趁机给自己的脸上贴了一下金。

4 1 4 的几件大错误都与我关系不大。不仅两派期间，从文革以来，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打砸抢活动，没有抄过家，没有打过一个人。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心里笃定得很。

他一时语塞。突然，他想起来了：“你参加‘围困中南海’了吗？”

“什么‘围困中南海’？”我想不起来文革中还有这么一档子大事。

“就是在67年七八月间在中南海西门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呀！”

“哦，原来是‘揪刘火线’呀！我参加了。”我恍然大悟，爽快地回答。

“那不是‘揪刘火线’，那是‘围困中南海’！这是中央首长定的性！是反党分子戚本禹幕

后操纵的反革命事件！”

我激动得大叫起来：“那时我们明明是去揪斗刘少奇的嘛！怎么变成‘围困中南海’了呢？”

“那你说说，你们是不是驻扎在中南海西门的府右街上？”

“是的。”我想也没想就回答。

“你说中南海里住的是谁？”

“当然是毛主席啦。”这是常识，我也不加思索就回答了。

“你看，你都知道中南海里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你们把中南海团团围起来了，那不是‘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

我一下子被他给绕进去了。要说，我算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工科生呢，竟被一个工人师傅轻易地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反驳。我不得不佩服他比我有更严密的逻辑思维，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要是说中南海里住着刘少奇就好了。不过，要是真的那么说了，麻烦可能就更大，说不定会把我抓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唉，我心想，为什么毛泽东、刘少奇非要都住在中南海里呢？

我不甘心地质辩：“要是那个时候知道这是叫‘围困中南海’，打死我都不去的！”

“可是，事实上你就是去了呀！”

“北京市去过‘揪刘火线’的有几百万人呢！学校里几乎人人都去过‘揪刘火线’！难道都有罪吗？”我想捞住最后一根稻草：法不治众嘛。

“你是4 1 4头头，你是4 1 4参与‘围困中南海’的重要决策人。一般的群众去围观了，不算大错误，更没有犯罪。你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不得不耷拉着脑袋。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谁叫我是4 1 4头头呢？

我一直在教研组里劳动，自觉矮人一等，夹着尾巴做人。差不多过了两年的时间，1972年12月29日上午九时半，谢、郭等三位同志代表党组织和工宣队的领导找我谈话，向我宣布清查五一六的审查结论：

关于孙怒涛的审查意见

孙怒涛（原名孙银基），男，三十岁，家庭出身贫农，原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604班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是清华4 1 4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现是电子系自动控制专业教师。

孙怒涛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曾参与了“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还散布过一些对中央首长有损的言论。经审查，孙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而犯了上述错误的，属一般错误。希望孙怒涛同志在今后应认真读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党总支 1972。12

我听了，对我参与揪“军内一小撮”活动这点提出异议。我说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学校里，没出去参与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

“难道你没有发表过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4 1 4那么多人出去揪‘军内一小撮’了，难道你作为4 1 4的二把手没有参与决策？这些难道都不是活动吗？”

我哑然。凡是4 1 4的所有错误，只要是我在校期间犯的，我都得沾上一份，无法逃脱干系的。

至于“散布过一些对中央首长有损的言论”，这是我自己在交代材料中就承认了的。从头头到小兵，4 1 4 反谢富治是人所共知的。在审查意见中指控我的三条错误中，我能心服口服的也只有这一条。

倒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我负有最主要的领导责任。我在交代材料中也如实写上了。但在审查结论中，却漏了这很重要的一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把仅负一般领导责任的“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撤下来，把“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一条加上去，这样的审查结论我认为更公允些。

一条也好，三条也好，只是多与少的差别，不是有与无的差别。只要有一条，也能照样对我审查，照样给我下这样的审查结论。我当时想，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谁不犯点一般错误呢？你能说自己一点错误都没犯过吗？

这样一想，我就老老实实地在审查结论上签字认可了。

哎……我真的好幼稚啊！政治审查后作为结论的“一般错误”，与我们口头上说说的“一般错误”，完全是两回事啊！政治审查结论是要入档案的，是一辈子到死都要跟着走的。

当我看完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才知道开始给他的审查结论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沈如槐死不签字，据理力争，最后改成为“一般错误”。

沈如槐是一把手，在百日武斗期间4 1 4所犯的严重错误条条有份。比起他来，我的那点“错误”都是小小不言的。而最后的审查结论，同样都是“一般错误”。我真觉得有点冤。我想，要是我也拒不签字，硬扛着，说不定到最后能一风吹吧？我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抗争和坚定。这就是一把手与二把手的差别。

我并不是因为沈如槐也与我一样只是“一般错误”而不服气。我更没有对把我揪出来的基层领导、老师、学生有怨气。但是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始终心存不满。这与我在“九评”学习后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九评”学习后我是服气的，我认为这是组织和同学老师对我真心的帮助。而这一次，我认为是整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第七条的第三段是这样写的：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在1966年我看到《十六条》的时候，作为学生的我，深感这是党中央在鼓励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文革运动，即使说错话做错事，只要不犯法，都不会被整的。我1968年之前的身份始终是学生。这“革命小将”的身份让我的胆子大了不少。但是底线是不犯罪，这是不能突破的。我在当头头期间，如果说有错误，也都是在“一律不整”的范围内，连“一般错误”也不应该写入审查结论、放入档案中的。如果要整我，那颁布《十六条》的这个政党先得公开承认，即使以中央文件形式许过的承诺也可以不算数的。要那样，倒也不失为光明磊落之举，我们这些被大整小整的人也服气些。现在倒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白纸黑字写上了庄重的中央文件，说过的话如同放屁一样，完全当不得真的！

清查五一六是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一次毫不留情的整肃。上层的权力斗争总是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作为代价的。随着林彪在蒙古沙漠的机毁人亡，又传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林彪幕后指挥的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每次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有个运动来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往这个箩筐上装，就像一个大垃圾桶。

因为林彪叛逃了，这个整了不知道多少人而且结束遥遥无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被声讨《五一七工程纪要》这个更紧急的运动中止了、替代了。

在给我宣布“审查意见”的时候，领导当面对我说审查结论和本人所写的材料均不入档案。我将信将疑。这么大的一场政治运动的审查结论能不入档案吗？入了档案，那么这样一个政治错误就跟定我一辈子，走到哪都知道。要是不入档案，万一再来一个什么运动，难道要再整一回？我搞不清对我个人而言，这审查结论究竟是入档案好还是不入档案好。

又过了两年，在1974年年底，教研组的党支部书记（不是那个郝书记）告诉我，在我出差期间，为落实政策，在一个专门小组的监督下，我本人所写的交代揭发材料已经全部烧毁。我没吱声，心里依然是将信将疑。对于组织的话，过去我是绝对信任的，现在已经大打折扣了。不是我不愿意完全相信组织，而是组织的所作所为无法让我完全相信。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将信将疑不是凭空臆想。

尽管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五一六分子，在文革中也没犯什么严重错误，但是攻心会那种紧张的气氛以及精神不敢有丝毫怠懈的高度集中，还是给我留下了后遗症。日后我在打桥牌的时候，握牌的左手会不由自己地微微抖动，像得了帕金森病那样，有时牌都握不住，要散落下来。我想，我尚且如此，也难怪前面那几位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被震出来的老师，也多少理解了在文革之初受到冲击的那些干部、教师为什么不堪政治重压而走上了自杀的“解脱”之路。

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忙于检查交代，急于解脱过关，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想得不多，也想不明白。

清查五一六结束以后，我心中充满了委屈和不满。自己觉得没有犯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要把我当作五一六分子狠整一通？414比团派强多了，对周总理的感情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414的头头也要挨整？总之，那时我是从个人和派性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又经历了好些事件，回过头来再看看清查五一六运动，换了新的视角。有了互联网以后，获得了许多资讯，有了新的认识。

本来只是几十个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在1967年5月份搞了一个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秘密组织“五一六兵团”，很快被中央发觉，被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到8月份头头被抓，这个组织马上就完了。这种事情在文革中是常见的，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奇怪的是，两三年以后的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吴德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这一清查，全国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整死的、逼疯的不计其数。

刘少奇派了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也就五十多天，被定性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样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前后整了好几年，后果远比工作组整学生更严重，倒成了无产阶级的正

确路线了？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有过批示、讲话。他们都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我对他们都有意见，都不满意。其中，我对周恩来的失望最大。这或许是因为原先对他最崇敬最敬仰的缘故。因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件事对他的再认识，他在我的心里开始了从圣到人的滑落。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往事追忆】

宋彬彬：“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 冯 翔 •

◇ 实际上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当时道歉什么呢？

宋彬彬：检讨我去武汉（编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说没想到做这些事情，结果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武汉发的那个署我名的公开信，我一看都傻了。我们的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我那同学说，她没想到，你们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也会被自己的人、被父辈给骗了。她特别震动。

还有，在卡玛的电影（编者注：此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过的许多人道歉。2007年圣诞节，我写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给我的同学们看，征求她们的意见。中心意思就两个：道歉和感谢。她们都是非干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找这些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

宋彬彬：因为她们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这些人在调查期间，对我们支持更多。她们敞开心扉跟我谈了很多。我确实非常震惊。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

很多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愿意谈当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2008年2月4日我们开座谈会，十四个人参加，干部子弟就我们仨。我、刘进、她。

◇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么？

宋彬彬：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张霖之（原煤炭部部长）一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箫，还送我一支箫，她觉得我适合学这个。我很小时她就认识我，说我真是文质彬彬的。上高中后，感觉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发现“宋要武”成为一个符号？

宋彬彬：“八一八”后，全国各地小报都说我在他们那儿支持他们。都要拿我这个“旗帜”说事。我们班同学都说，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打人啊？到学校来看我的外校人特别多。我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人。他们都特失望。说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应该很革命，起码不能劝人不武斗吧。还有人说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个恶魔一样。我到内蒙插队，当地人就听说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国以后，人家介绍他，都说：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说：我是我，什么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真实想法是什么？

宋彬彬：我们当初是保工作组的一派，觉得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红卫兵了，8月1号他给清华红卫兵写的信流传出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得服从。

广播喊女附中来40个人前边集合，刘进就让我挑人带过去。我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我们以为是到前边儿做标兵，所以都挑的个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门。

在城楼上，当时我后边那个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献，那献就献吧，我也没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结果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就广播出来我跟主席的对话了，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电影都出来了。

当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个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认识的同学都没有认为主席是要我改名。这就是开一个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个人对我说，后来他跟你道过歉。

宋彬彬：对，有一次他跟我道过歉。他有什么可给我道歉？不能把什么都怪到人家头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儿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说话？

宋彬彬：我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消息就跟着来了，尤其是华语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宋要武”怎么怎么。我那时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剑生跟我说：别怕，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心里就是平静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我就被说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国朋友的话说，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学者都愤怒了，说这跟小报不一样，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时我才感到，我不出来说话不行了。

2002年，靳剑生找刘进，希望联系实验中学，再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没有打人。我们说话不管用，让学校来说。这事后来也没办成。第二年我回国了，就打电话给刘进，要弄清一些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查了。

南方周末：后来为“宋要武”这个名字你做过调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国创业以后，开始就他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调查，一个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谁编出来的，他去光明日报找了一圈，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

另一个是我改名字的问题。他信得过我，知道我没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证据，想查当年的户口。结果人家告诉他，当时没有电子录入，都是纸档案。你得开介绍信，这个很难开；你开到了也查不到。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仓库里，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几年都翻不到那张纸。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来说话，是否有别的担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掺合，人家就容易受牵连。所有介入我这事的人都要挨骂，像冯敬兰，她当初写《请放开宋彬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么多年她被网上骂得狗血喷头。我们班有个同学，跟我同学六年，很了解我，曾写了篇《818的红卫兵们》替我分辩，被骂得一塌糊涂。同学们岁数都大了，都想过一个安逸晚年，结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看我们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发言，气氛那么好，现在因为我而彻底死了，各种人在上面乱骂。实际上还是要用我这个符号做文章。他们说的是“宋要武”，不是我这个人。当然我承担了这个压力。

◇ 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

南方周末：你参与调查是自己出面吗？

宋彬彬：我参与调查，都是先找学生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很多比较敏感的，我都是让刘进出面，省得给人家增加压力。一些人如果我去问，她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就像德国电影《朗读者》里的男主角麦克，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说。如果我是汉娜，去问他：你

为什么不能为我作证？那他就会很为难。我不想那样。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殴打卞校长的凶手是谁，好为自己证明清白？

宋彬彬：没有。我就是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实际上谁打了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人她都认识。那天发动批斗的，就是她们班级的人。你不能随便造谣，歪曲历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涛去了两个地方去申诉，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教育局，谁都不管；发动起来（打卞校长）你一下我一下，送到医院医院不救，你说谁是凶手？从上到下，到最后的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们参没参与殴打，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么多年调查下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红标发掘的档案说，你们“八五”当天去北京市委汇报时就说清楚了。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

宋彬彬：学校同学都看到是高一3班发动的。我们找这个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有些班干部我们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涛说的，谁打了她，每个人的名字她都知道。这不是秘密。我们找梅树民老师调查时，他说那天他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到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是哪个班的。后来他还是跟我们说了。

南方周末：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

宋彬彬：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

南方周末：这些年推动你往前和往后走的人是谁？

宋彬彬：往前是刘进、冯敬兰她们。拉我往后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个从上而下的大事件，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不能再伤害你这些同学和她们的家人。你看于羚，说她是“卧底”，太冤枉啦。

还有从我自身考虑的。比如我先生，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你出来讲话，新的证人和证词又会出来。与其忙这个，还不如干些应该干的去。你越说，他们越来劲，越制造新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起诉袁腾飞诽谤，我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历史。靳剑生一再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要是跟谁都骂架，骂得过来吗？

◇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

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

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



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

◇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

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

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

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

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

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

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

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

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

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 “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

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四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

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珪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

意。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 原载《南方周末》2014-03-13

~~~~~  
【拒绝遗忘】

回应宋彬彬等

• 王友琴 •

网上最近流传《南方周末》上周发表的一组对宋彬彬等人的专访和报道。他们多次提到我的名字。下面是我的回应。

在我写的《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52万字）中，有659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调查采访。南周报道涉及到这本书中的三个人。

一，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负责人，在1966年8月5日在学校中被殴打折磨四个小时后死亡。这一章有两万字长。（见本刊zk0103a——编注）

专访中，宋彬彬用两名外国学者的话来说我对八五事件、宋彬彬和她的父亲的描述是错的。其中一位学者的性别和国别都被宋彬彬弄错。另一位 Emily Honig 则回复了我的电邮。Honig 不承认曾经对我的文革研究作过宋彬彬所讲的这种否定性评论。而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学者真的说过，也不能证明我的有关叙述是错的。宋彬彬自己也说他们“没有调查”。我在书里描写了卞仲耘被虐杀的过程，描写了宋彬彬在该校文革中的作用，写到了8月18日宋彬彬献红卫兵袖章后，报纸头版关于“要武”对话的报道，和《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提到宋彬彬的父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召开）上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些都是事实。高干子弟和他们的父亲的行为会有互相扩大的效应，这也是常识。我的书里还写了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在师大女附中校园里，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名19岁的服务员被当作“流氓”抓到学校化学实验室里，绑在柱子上活活打死。女三中，男八中，师大二附中，宽街小学等一系列学校负责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同时暴力虐杀从学校扩到全社会。北京有1,772人被杀害。这些都是事实。

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2012年我曾和刘进见过一次面。我要求她指出我写的卞仲耘之死哪一句不符合事实，她沉吟片刻，说，你书里写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了。不对，没有死。我们排了班值班，一人两个小时，第一个人时间还没有到，就死了。我当时就请刘进写一篇文章，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但是一年半过去了，她没有写。也就是说，她能指出的这个唯一的“错误”，她也不能肯定。

二，李文波，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家中被女十五中红卫兵打死。他的全部罪名是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及从前有过小产业。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破四旧”，一项内容是没收私人房产。大批有自己房产的人在交出房契后仍然遭到抄家和殴打，有的被打死。红卫兵指控抄家时李文波砍伤了红卫兵（后来有人指出这不是事实）。不但李文波被当场打死，李妻刘文秀两周后被判处死刑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女十五中负责人梁光琪，一位和卞仲耘身份经历相似的教育工作者，在同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我的书中有更多细节。（见本刊zk0101d——编注）

该报道中，印红标教授说：“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这是本末倒置，把结果说成了原因。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24日，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高达44人。而作家老舍等28人在8月23日就在北京文庙遭到大规模的殴打和侮辱，导致老舍在24日投水身亡。在8月18日大会后，每日被打死的人数上升，在9月1日达到最高，278人。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把这样大的惨剧发生归于李文波的甚至还证实不了的反抗是错误的。

另外，该报道说，1,772这个数字是印红标教授1993年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后来被很多学者引用。实际上，这个数字发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不需要他在13年后“发现”一个早已公布的数字。

三，张放，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包括“活埋”一把她丢入坑里，把土填到齐胸，再挖出来。1968年春天开始第二轮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时，她逃到新乡，被当地“革命造反派”抓住。二龙路中学“革命委员会”派人到新乡押解她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张放遭到“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殴打。5月19日她写下“绝命书”后“自杀”。时年40岁。

记者冯翔的报道说“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他举的例子是刘秀莹老师说，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的女儿烧了案卷，不让弟弟知道。这不是事实。

张放家人一直保留着她的绝命书等资料。他们也都知道那个打了张放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字是纪泽华，当时19岁，红卫兵。纪泽华文革后被调到北京第四十一中学，当了校长，200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校长”。张放家人写了文章纪念张放但无处发表。他们为张放修建了坟墓和石质墓碑。他们没有想要遗忘。刘秀莹老师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他们选择遗忘的消息。（见本期：“文革受难者张放”——编注）

最后我想谈到报道中多次提到的刘秀莹老师。她1950年代初在师大女附中毕业，因家贫没有升大学，留校教书。她曾经担任薄熙来妹妹的班主任。尽管她在文革前就已经调出女附中，1966年“红八月”中初三学生薄小莹带着红卫兵抄了刘老师的家，把她家的东西“能砸的都砸了”。（在我的发表物中并没有说到薄小莹的名字。但是现在看到她发表的关于她家人的文革遭遇的文章，认为应该把她的名字写出来。）文革后，刘秀莹老师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调查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她特别调查了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红卫兵打死之事。沙坪从1966年8月19日起连续遭到毒打，8月20日在全校大会上被打死。

刘老师是2001年出版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北京教育出版社）一书的副主编。该书指出：“（1966年8月18日后）短短的几十天里，仅西城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职工，就有上百人被迫害致死，伤残者不计其数。”该书一一列出了卞仲耘、姜培良、沙坪、华锦、梁光琪、易光轸、张冰洁、王哲（应为两个“吉”组成，对不起，我的这个电脑里没有这个字）、赵香蘅、郭文玉、邱庆玉、刘竞珍共十二名北京中小学负责人的名字，说他们“在这场红卫兵运动中，受尽折磨，含冤致死。”（第255页）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垚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垚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垚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我在1990年代做调查采访时认识了刘秀莹老师，得到她的帮助和指点。2004年《文革受难者》出版后，我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她则告诉我，薄熙来邀请她和别的老师到大连度假了，“招待得非常好”。离开时送了他们每人一箱礼物，“非常好的礼物”。她告诉了我“礼物”的内容，以及对他们不要再提文革事情的要求。当时薄熙来正在权势上升时期。2013年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那是刑事法庭的判决。刑事犯罪固然要重视，刘秀莹老师揭示的薄熙来对文革历史评判和书写的干预，也值得历史写作者深思。我也一直钦佩刘秀莹老师的诚实、正直和坚持道德原则。我也认为不能把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死者身上。

我只是个“历史的义工”。我用了大量业余时间来写作文革历史，是为了保留真相追求正义，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从文革历史中受到教育，学会分析外界的煽动和蛊惑，也学会分析自己内心的野蛮和盲从，不要再做文革中红卫兵所做的残忍行为。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ywang7@uchicago.edu。我欢迎读者来信订正增补我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书。也希望读者们提供资料，一起来参与写作历史。

2014年3月25日

□ 原载《共识网》

~~~~~

##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张放

• 王友琴 •

张放，女，1928年生，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员，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她不堪虐待逃离学校到河南新乡一名以前的学生李雪丽家中。被当地“造反派”抓住并侮辱和毒打。该校红卫兵负责人追到新乡，也用拳头打用脚踢张放。1968年5月19日张放在新乡自缢身亡，时年40岁。

第一次听到张放的名字，是在和已故作家王小波通电话的时候。那是1996年，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读过什么王小波的作品，打电话原来也是为了找他的妻子而不是为了找他。多年以来，为了记载文革历史，我和很多文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谈话，我注重了解的是文革事实，是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被迫害的遭遇。不巧，那天王小波的妻子不在

家，他接了电话。我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他立即就理解了我在作什么或者我要什么。他说，你调查过二龙路中学吗？二龙路中学有个老师叫张放，在文革中自杀了。

我说我已经调查了将近100所学校，但是，二龙路中学不在其中。

王小波说，张放是个女老师，是物理老师。1966年夏天，“红八月”的时候，和邻近的中学一样，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很厉害。学校领导人和一批老师都被抄家并遭到毒打。教导主任的父亲母亲，据说是“资本家”，被毒打后，上吊自杀了。张放也被打了，被严重打伤了。但是她在1966年没有死，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再次被整，她自杀。

我立刻在电脑里的受难者名单中加上了张放的名字。那里已经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事实上，调查文革历史是一个繁难并且令人痛苦的工作。在调查中，要弄清楚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经过，往往要经过很多周折，花费大量时间。这不但是因为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也是因为许多人为制造的困难。而且，在终于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因为是发现了一个残酷而不幸的故事，所以其中绝没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发现的快乐，而只是带来另一份悲哀。

王小波对张放的记忆与叙述也使我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人们对一个人的死亡和不幸遭遇的记忆与叙述，实际上是不相同的。正是因为看到了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才对王小波的反应印象深刻。

我曾经向当年其他中学的学生在文革后成为作家的调查文革。对文革中在身边发生过的相当残酷的事情，不止一人相当缺乏记忆，或者以“不太厉害”“不重”来描述。这多多少少反映了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漠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不被觉察的对他人痛苦的漠视，比较王小波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要普遍得多。当然，当对红卫兵的赞扬还在公然发表的时候，这种漠视相比之下也就讽刺性地显得像是错误“不重”了。

后来我读了王小波的杂文。我感觉到他在杂文中所作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包括对1996年兴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潮的抵制，是和他对文革的看法，对死难者的记忆与同情，在原则方面贯穿一致的。但是，在我有机会见到他之前，他却不幸去世了。1997年，王小波的妻子请我给他的杂文集写一个后记。我写了。我首先写到了他告诉我张放老师的死。我感谢他对我文革研究的支持。我认为他对文革的记忆和对死者的记忆，和他的杂文的成就有相当的联系。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成为书的“后记”，但是被发表在1998年第三期的《方法》杂志上。这个杂志在不久以后就被查禁了。

我想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中的关于张放的段落。但是，我总是想，对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学女教师的死亡，应该记忆而不应该漠视，这不但关系到文革历史的真实，更关系到文革记录者的道德原则。

张放生前教书的二龙路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西单附近，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过一公里左右。二龙路中学的旁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和二龙路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1966年8月5日，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当场活活打死。应该特别指出，害死了张放的校园暴行就发生在这样的文明的核心地区，而不是什么偏僻荒野的地区。这是因为，文革就是从上而下地被发动起来的，校园暴力就是从北京市中心扩展到全国的，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的发动和红卫兵组织的作用。张放所遭遇的，绝不是她一个人的遭遇。

王小波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二龙路中学初一的学生，初一没有物理课。也许正因为此，他把没有教过他的英语老师张放误记为物理老师了。不过，对一个没有教过自己的被害老师的记忆，其实更表现出了他的敏感。他的同代学生中，很多人不记得1966年到1968年的校园恐怖和他们被害的师长和同学。

1966年文革开始时任二龙路中学校长的徐丕凯老师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张放的遭遇。1966年国庆节前夕，徐校长和张放等都作为“牛鬼蛇神”由该校红卫兵押到安定农场劳改。他们在那里除了被迫干繁重劳动以外，还被本校红卫兵和来北京“革命大串连”的广州八一中学红卫兵任意批斗、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徐丕凯、张放等人活埋，即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将张放抛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满身粪污爬出来后，他们又抬起张放喊着“一二三”，再把张放扔回粪坑。徐丕凯校长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于是红卫兵怒斥徐丕凯“包庇牛鬼蛇神”，将他双手绑上（没有绑在树上）当活靶练刺杀。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长木枪向徐丕凯前胸狠戳猛捅，造成数根肋骨骨折。

在1968年，开始了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这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张放活过了1966年。1968年，她继续被整。她不能忍受，就逃到了河南省新乡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李雪丽家中。文革时代的严酷“斗争”，当然是和对个人行动的严格控制配合在一起的。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在当时敢于公开说出，这种把人关入工作单位设置的牢房“审查”的行为是违反宪法违反人道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工作单位，当时就被视为最为“严重”的反抗行为了。不然，就只有逃离这个世界，自杀。实际上，文革自杀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就在二龙路中学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35岁的化学教师胡秀正，在1968年8月11日，在她被关押在校中“隔离审查”的时候，从学生宿舍的5楼上跳楼身亡。

1968年，李雪丽18岁，是新乡无线电元件二厂的工人，她在文革前曾随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在二龙路中学读书两年，张放教过她。她了解到张放在学校里遭到的毒打和折磨，写信给张放请她去新乡躲避。这种勇敢和慷慨，在文革中是很少见的情况，也愈加值得我们珍视和褒扬。

李雪丽家附近“新乡市房地产公司”的“革命造反派”发现了张放，把她抓起来，关押了四天，刑讯拷打，而且侮辱了她。他们也通知了北京的二龙路中学当局。该校派了一名人事干部和一名红卫兵负责人到新乡押解张放回京。这个红卫兵负责人在1966年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候他就是打张放的学生之一，在1968年已经成为该校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委员。他在新乡打张放耳光，还用脚狠踢她。张放不能再忍受，她留下了遗书，自缢身亡。她的遗书里写到了她在新乡挨打的事情。文革后，1979年时，这份遗书还保存在新乡公安局里。

1979年，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学校派青年教师张效松陪张放的女儿唐津津去新乡寻找张放遗骨。在新乡凄凉的坟场里，她们找到了文革结束后唯一的一座无主坟，推断可能是张放的下葬处。当年张放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记。他们花50元雇人掘墓开棺。张放身材矮小，当唐津津看到母亲35号的塑料鞋时，确认了母亲的遗体，悲痛可想而知。张效松亲手帮津津把遗骨入殓，火化后拿回北京。

1979年，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由于家属要求落实政策，学校派青年教师张效松陪张放的女儿唐津津去新乡寻找张放遗骨。在新乡凄凉的坟场里，她们找到了文革结束后唯一的一座无主坟，推断可能是张放的下葬处。当年张放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

记。他们花50元雇人掘墓开棺。张放身材矮小，当唐津津看到母亲35号的塑料鞋时，确认了母亲的遗体，悲痛可想而知。张效松帮助唐津津把遗骨入殓，火化后拿回北京。

由于当时打张放的红卫兵负责人在二龙路中学任领导职务，张放亲属强烈抗议，难以开追悼会。西城区教育局调走了他，调到第四十一中学。此人后来当了校长。

1968年在新乡关押侮辱了张放的那个当地“革命造反派”头头，也是其所在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后被判刑。迫害张放和那个人的其他罪行（贪污和强奸妇女等）一起写在刑事犯罪判决书里。张放家人存有判决书的副本。

帮助了张放的学生李雪丽，在张放被抓走和害死后，在工厂里遭到大会“斗争”。那时她是十八岁的年轻姑娘。此后，她有一段时间神思恍惚，精神抑郁。李雪丽后来患乳腺癌，在55岁时去世。张放的家人一直感谢她帮助了张放，也为李雪丽遭受的不幸感到深深的悲哀。

1979年时张放的女儿唐津津是北京大北窑一带一个工厂的工人。她有一个弟弟，名叫唐今阳。张放的丈夫名叫唐九旭。他们三人一起写了纪念张放的文章，但是没有能在媒体上发表。他们保存了张放的遗书和其他资料。1989年，他们给母亲修墓，立了墓碑。墓碑上刻字：亲人张放之墓。立碑人落款是：唐九旭率津津今阳敬立。

记得张放名字的作家王小波，见证了张放的苦难的她的同事们，更不要说她张放的家人，都没有忘记张放：一个被文革害死的人，一个穿35号鞋子的小个子的女人，一个母亲，一个普通中学教师，曾经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的中心的一个中学里教书。

在我们能责备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前，确实不必多加责备那些忘记了学校里的死亡和残暴的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赞扬那些牢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人，赞扬那些记住了张放和别的文革受难者的人们。特别是，我们要赞扬帮助过张放的当时十八岁的李雪丽，她是那个血腥年代中难得的英雄。

#### ◇ 附录

说明：2007年3月，张放的儿女在电脑网上看到笔者的文章后和笔者联系，提供了张放的绝命书复印件和在新乡抓捕殴打张放的当地一名“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文革后被判刑的判决书，还有其他资料。读者可以从以下两份附件，进一步了解文革的残酷和丑恶

#### 附录一、绝命书

我从小参加革命，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只是思想上有些问题不同，你们就这样迫害我侮辱我！毛主席说：思想问题要用说服教育、讨论、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你们哪里真听毛主席的话？最喜欢用形“左”实右的一套。我死得好冤啊！但是连革委会的委员还在这里打人，我回去还受得了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人”的味道，应该把抢去的290元和70斤全国粮票以及我的衣物运回我家。我这都是劳动工资所得，并非剥削的，你们不要侵吞。

可怜两个孩子还未长大，失去了妈妈。爸爸的身体又十分差，请你们看在私人面上再不要去迫害我全家了。也不要迫害李雪丽，她究竟还是个孩子，一切罪（如果真有罪的话）都由我一人承担吧。

张放

1968，5，19，夜于新乡



## 附录二、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9)红刑字第26号

起诉机关：新乡公安局

被告：贺廷智，男，48岁，贫农出身，工人成分，文盲，汉族，原籍河南省封丘县人，捕前住新乡市民族西路324号，被告自幼务农，学徒。四七年在封丘县伪保安团当伪兵月余。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当工人。一九六七年结合为新乡市房产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被拘审，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依法逮捕，现在押。

本案经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告贺廷智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将路经我市的北京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非法关押在新乡市房产公司，并伙同罪犯赵保许（当时是房地产公司革委会主任，已判刑劳改）私设公堂，非法审讯，而后又通知北京市二龙路中学的纪泽华、张宏宝三人来新乡房产公司，非法审讯，动手打人，致使张放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含冤自缢死亡。被告贺廷智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利用职权，借以安排住房和协助调动工作等手段，奸污妇女四名，奸污未遂一名，同时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公款六百六十五元（已退清）并受贿大米、花生、粮票、棉花、香油等物。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贺廷智非法关押、私设公堂、非法审讯、致死人命、奸污妇女、贪污受贿罪行严重，被捕后尚能交待认罪，本院依法判处贺廷智有期徒刑拾年（刑期从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起至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应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写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圆形公章）

~~~~~

### 【抢救历史】

呼吁对卞案不追究当事者个人责任，只公布真相

• 唐 燕 •

文革冤案难以数计，四十多年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灰飞烟灭。

但在文革首善之区的首例打死校长的卞仲耘案不同，它一直受到国内外最广泛的关注，自刘进宋彬彬道歉以来，卞案更引发了经久不衰的热议。更为重要的是，与大多数文革苦主不同，王晶垚老人当时就留下了不少证据，而且至今仍一如既往地怀着理所当然的求真相的执着追求。

王晶垚老人的时间不多了，广大民众已经关注、等待了四十多年了！

文革刚结束时，我们处理文革冤案采取的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以组织审查取代法律审判的方式。这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

现在弥补这一遗憾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用法律手段还清历史旧账。民众和解及历史正义只能建立在历史真相的基础之上，而历史真相只能由检察院立案调查。

可是据网友小熊说：

“八五事件需要检察院立案，王晶珪老人作为原告的一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正是老人最早的思路。

根据我在网上读到的材料，这条路王晶珪老人走过了艰难的十年，没有走通。1979年，王晶珪提交给检察院的起诉书第一是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凶手，其次才是控告一个挟私报复制造伪证的校外人员袁淑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事件“逾期“为由，下达”不予起诉决定书“拒绝立案。王晶珪继续上告了九年，我想他是动用了自己的各种关系，通过各种可通的渠道（普通人可能做不到，既没有他的韧性也没有他的能量），几经曲折，最后他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依旧以事件“逾期“为由，认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免于起诉决定”应予维持“（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

王晶珪老人肯定是比我们任何人都希望此事能进入法律程序，20多年前他就将自己的希望付诸实施，全力以赴，在高检的这份文件上，老人写下”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据冯翔《我，没有忘记历史》一文中说：

“胡志涛的儿子回忆，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

由此看出，在八十年代初公安局就对卞案立案调查过，并已获取了相当的材料。现在即使这些材料需要完备也轻而易举：这些年王友琴、刘进们都做过调查、回忆，并收集到了更多较为详实的材料；与其它文革冤案中不少当事者、证人已去世不同，卞案中当年年龄尚小的中学生打手及目击者们现在都还活着，她们能够履行其作证义务。

虽然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卞案早就”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卞案重新立案的确非常有难度。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章第15条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其实，王晶珪老人只是想求真相，不是非要把当年未成年的“真凶”“置于死地”。所以，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按照此第15条的规定，在宣告“打手”无罪的基础上公布卞案真相？即使这样做不符合规定，既然卞案有着特殊性，能否特事特办，以便给王晶珪老人、给所有文革苦主文革受害者、给广大民众一个交代、一些慰藉呢？

吁请所有关注此事的人，特别是刘进宋彬彬们、王友琴及其支持者们摒弃前嫌、团结一致，为有关部门公布卞案真相而努力。

□ 原载《共识网》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